

一張支票定終身

(本文插圖刊第六頁)

萬君和著 續伯雄譯

贈我五十美元程儀

我跟盧白先生的結識，緣自於一張五十美元金的支票。但我倆都不曾想到，那張他在戰時重慶一個雨濛濛四月清晨所隨手塞給我的支票，在我欣然接下的刹那，竟會改變了我往後一生的行向；最後更因盧白先生提攜，在他麾下馳騁左右。說來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，於今我藉着祝賀盧白先生九十大壽的機會重提此事，想必當年的許多老同事都會感到驚訝，甚至會「老聞」本人，一定也已忘記了這回事。蓋對他來說，這不過是他不經意間施惠他人的小事一椿。

話還是要從戰時重慶說起。那個時期，日機轟炸頻仍，跑警報已多多少少成為陪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。盧白先生主持下的「國際宣傳處」，有一同也成為日機蹂躪的目標之一，幸而處所雖曾中彈，却未受日寇所脅，始終屹立原址不移。

「國際宣傳處」在名義上隸屬於國民黨「中央宣傳部」，不過一切業務獨立，顯然是因戰時需要而產生的一個機構，其性質頗與美國的「戰時新聞局」(OWI)近似。可是在權責上，特別是在預算、人員編制和組織上，國際宣傳處實遠有不逮。

我是在民國三十年四月裏一個陰雨天的上午

，懷着一封國民黨要員的介紹信，前去借用巴縣中學的「國際宣傳處」求見曾處長，他的辦公室在一幢毫不起眼的破樓上，壁垣彈痕累累，觸目可見。進入室內，見他戴付眼鏡，口啣煙斗，其人立時給予我一種滲合着濃郁西方文明的典型大儒印象，他滿面和藹，是南方人中很少見的大個子。

他對信上有關我擔任過英文教員及熱衷時事研究的履歷介紹，頗感興趣。我也直言不諱，說明我已取得了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的獎學金，將赴美進修英文，但身為流亡學生，急需張羅旅費。他看似被我篤學向上的陳述所感動，就代表國際宣傳處無條件的塞給我一張五十美元金的支票。我拿着那張支票，禁不住為之狂喜，蓋在當年那種艱困的時期，五十美元金之數，足以令許多跟我處境一樣的青年男女欽羨不已。為此我頗感受恩太深，當即決定，索性將五十元保存起來，非萬不得已，不予動用，務必勿負曾先生這筆厚贈的期望。

進入歌大研讀新聞

民國三十年八月初，我去到伊利諾州奈帕維爾市(NAPERVILLE)的「北中大學」(NORTH CENTRAL COLLEGE)。由於這是一所由遵道會支助的學校，所以我一路由舊金山搭火

車到奈市，都能享受到優待牧師的廉價車位。

我在北中大學總共念了三個學期，以之加上我在國內修畢之學分，便有資格取得一個美國大學的學士學位。唯入學初期，於學雜費全免而外，我只有一份每小時三角五分錢的工作，只勉強够我支付膳宿所需。到了那年十二月七日，日本偷襲珍珠港事變發生，我的情況反而因此有了改善。蓋美國國務院於事變後不久，對於經濟來源中斷的中國學生，提出了清寒救濟的辦法；並在特別安排下，授權給紐約「華美協進社」辦理，凡能提出清寒證明及學科成績達到相當標準的學生，均可申領。我也是具此資格的申領人之一，唯規定在受領期間，必須定期向「華美協進社」提出學業進度報告。

我於民國卅一年八月，收到了「華美協進社」的面試通知，顯然他們已審閱過我最近的學業報告，我在報告中表示，我即將拿到北中大學的學位，並已被布朗大學核可，將於次年春天入該校研究所攻讀語言學。可是，當「華美協進社」社長孟治博士跟我約談時，他建議我考慮一下，改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深造。他說，那裏有一項哥大為同盟戰爭提供的高級班短期課程計劃，年中就要開課。

實則，孟博士對我直陳，他是在替董穎光博士就新聞科系中物色具有英文寫作專長的中國學

生。董博士本人就是哥大新聞學院出身，那時他正陪同蔣夫人在美國各地演說。

董顯光博士招兵買馬的號召，激起了我對新聞事業的憧憬。董博士個人早自上海「大陸報」(CHINA PRESS)與「密勒氏評論報」(CHINA WEEKLY REVIEW)時期，就開始追求新聞工作，我對他敬仰已極。董博士乃蔣介石元帥暨夫人的親信，盡人皆知，他是全權主管中國對外宣傳大任的負責人。

心意既定，我當即於是年下學期結束後改去紐約，到哥大新聞特科班註冊。短短幾個月後，我就進了「紐約先鋒論壇報」(NEW YORK HERALD-TRIBUNE)，擔任地方新聞記者。在此應附帶一提的是我從奈帕維爾去紐約的火車票，就出自我國前曾虛白先生送的那筆五十元程儀。

在國際宣傳處工作

民國三十二年十月，一如命運所預定，我果然回到重慶在董顯光博士與曾虛白先生身邊工作，被分發在國際宣傳處編撰科。董與曾則同室辦公，董那時的正式官銜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，國際宣傳處雖由曾領導，但一般認為，國際宣傳處自始即在董博士孕育呵護下成長。

當年的編撰科同仁，還有科長鄭鈞、科員趙敏求、朱撫松、陶啓湘和張彼德。沈劍虹原是該科科長，但在我到職之前，他已先我去了美國，榮膺新命。戰後我跟他又在南京碰面時，他隨口對我說：「重慶那個小地方怎麼容得下你我二人

同展抱負！」

平心而論，董博士和曾先生在我心目中，軒輊難分，他們對我一生的事業與生活，由語言鑽研、新聞訓練，以迄服務公職，都影響至鉅。我是在董博士感召下由他資助全部旅費回國，曾先生則早已給我套上「一道緊箍咒」。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後，董博士一度卸除政府公職，打算從事私人事業，而將重任留交給他的「化身」曾虛白先生肩擔。我們處裏同仁，則都繼續輔佐曾先生，務期政府部會間的良好關係維持不變，我們面對的困難及障礙極多，所幸能够盡加克服，卒獲成功。正當董博士離職之際，適有馬歇爾元帥的和平特使團於民國卅五年年初抵達南京，曾先生和我對此事興趣甚濃，並一起目睹及報導了此一由中國問題衍生的插曲的全部結局。其間，美國這位五星上將政治家，態度堅定，而且馬不停蹄的扮演著樞紐的角色。那時主要由他設計的戰後歐洲復甦計劃，方成功不久，他便被美國總統基於善意和建設性的想法派來中國調阻內戰。然而，理由極其明顯，馬歇爾挑起盟友互鬥（暴躁的杜魯門對抗堅忍的蔣介石，便宜了頑劣的毛澤東）的這趟使命，是全盤失敗了。有些公正的美國觀察家事後檢討：「美國爲了謀取世界穩定，一味對促進中國的統一表示關切，實屬天真。」此一具有強烈說服性的評價，直到今天依然正確無誤。

共度歡欣愉快時刻

回憶當年跟曾先生共事的時日，特別是在董

博士從政界自行引退之後，曾先生跟我兩人對於能够恪遵董博士所望立的觀念與原則，在許多時候共享著無以爲名的滿足感，也引以自傲。同時，我們也在一起共度過無數歡欣愉快的時刻。

譬如在南京時，當年巴中的老同事們，週末晚上便間或聚集在曾先生官邸玩羅宋牌，除我之外，熱衷此道的人通常還有女主人曾夫人吳靄真女士、倪源卿（董博士親信之一）、新任外事科長沈錦博士與擔任政府譯員的王家楨。有時曾先生也來加入牌局。不過可以想見的，無論任何場合，曾夫人憑藉着她高貴的人格與舉止，總是風頭最健。

說到這裏，我覺得不能不回頭談談幾年前在臺北因久病去世的王家楨，想必曾先生跟我一樣的敬重他並懷念他，說實話，他畢竟是我們的老搭檔之一啊！他最令我們追念的成就之一，應是他逕譯的考門夫人（MRS. CHARLES E. COWMAN）暢銷名著「荒漠甘泉」(STREAMS IN THE DESERT)。此書於民國四十八年奉先總統蔣公之命譯成後，直到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蔣公逝世那段期間，都是國內各界領袖研讀最勤的四本書籍之一。其後爲永恆敬仰與紀念蔣公，這四本書均被置放在蔣公靈柩，除王家楨中譯本「荒漠甘泉」而外，其它三本則是「聖經」、「三民主義」和「唐詩三百首」。

再說南京天目路曾先生的宅第，記得董博士和倪源卿有時也在那裏借住，不只一次，當我們聚在那兒玩我們着迷的羅宋遊戲時，會聽到董博士以他那典型莊嚴的步態走下樓來，笑口大開的

歡迎我們，而後就撇着嘴唇習慣性的提出警告：「你們當心，却里（作者英文名）可是一條吃人的鯊魚！」不料幾年後在臺北董博士家裏，他於我跟露西赴美前夕設宴餞行，席上就有一條雖非虎鯊却大得嚇人的魚，而且那條大魚還是董博士自己上魚市場挑購拎回家的。那晚的女主人，是我們自重慶時代算起多少年來無緣識荆的董夫人莎莉，她和藹親切，談吐溫雅，整個晚上由於董夫人對追隨董博士左右的那些人逐一評論，活靈活現，令我們歷久難忘。

而最值得我們珍念的，則是我們兩家人的親密情誼，經由這次聚會啓端，一直持續到董博士伉儷駐節雙橡園許多年之後，彌久益堅。

自薦遯譯董博士傳

說到這裏，我願提一提曾先生自薦擔任中譯的那本董博士自傳——「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」。曾先生的請求，於董博士過世一年稍後的民國六十一年二月，向住在華府的董夫人徵詢同意。基本上，董夫人對曾先生之適才適任，毫無所疑。特別是因曾先生跟她先夫一生共享榮顯，是她向所信賴的人，因而董夫人堅信，以曾先生中英文造詣之深，所具學者兼新聞記者的地位，絕對是最合於從事這項艱巨工作的人選。

不過，當全書最後行將發行之際，一生篤信基督的董夫人，却毫無迴旋餘地的鬧着非把中文版的一切收入，都用於推展基督教務工作不可，推翻了多數董博士早年好友跟僚屬們所建議的辦法，以之成立一項「董顯光新聞學術基金」。董

夫人甚且強調，假若董博士仍然在世，也會在任何情形下爲了基督信仰寧願放棄其一生所有。她言下之意，董博士生前最熱愛的乃是宗教事業，而非新聞事業。爲此，關心董家的朋友們，曾千方百計婉轉的向董夫人解說，並動員了她們在美國留學的兩位千金致體與雅莉，苦口婆心的請求董夫人注意細讀書中談「董博士生平」那一章，董博士在文中對他自己的最大志趣，說得很清楚。其中有一段董博士曾後悔的說：「回顧過去，假若我不曾改向離開了我的新聞崗位，我一定可能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。」

一封感人的徵詢信

然則，這些辯解並未能即時說服董夫人。直到過了幾近一年，曾先生才又寫了一封信給董夫人，再次徵詢她的同意。

這封信由曾先生私下寄到我處，而使我有了再一次爲曾先生充任翻譯與簽約代表的効力機會。信是以中文書寫的，要意略謂，原約定連載董傳的當地中文報紙，已箭在弦上。

爲此，曾先生向董夫人懇求說：「在我腦筋還可派用場之時，讓我對老友就再出一分力吧！」曾先生這封信寫於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廿八日，我適時的轉給了董夫人跟她的兩位女兒；顯然的，母女三人都受到此信之感動。

曾先生很快的就獲得完全授權去進行全書的遯譯及出版事宜，並由臺北「新生報」先行連載。至於稿酬、版稅與著作權問題，也大致有了滿意的解決方式，一項「董顯光博士新聞紀念基金

」，在董夫人首肯下，遂告成立。全部版稅與銷售所得均納入基金項下，而且爲了展開基金徵募，董夫人和家人帶頭先捐出了美金一千元，此舉立刻掀起主要來自臺灣和美國令人鼓舞的反應。

溫馨難忘的餐敘會

當董傳中文版於民國六十二年夏天刊行不久，董夫人趁曾先生是年半官式訪問華盛頓的機會，曾當面對曾先生譯述其先夫傳記之辛勞表達謝意。那次跟曾先生同行的，還有兩位國民黨的卓越領袖人物谷正綱和袁守謙，他們過去都曾跟董博士長期共事過。在董夫人設宴款待三位貴賓的席上，她提到民國以來這許多艱難的歲月中，曾先生對她先夫從政及拓展事業時之襄助，厥功至偉。

如今回顧那次聚餐，記得席間還有董家那對一樣動人且個性相近的姊妹，以及跟董家較親近的友人胡旭光夫婦、高克毅夫婦、陶啓淵夫婦、李強光跟筆者，那真是一次頗具歷史性而且令人溫馨滿懷的聚會，如果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，便是董博士的僚屬和他家人之間的關係，經由這次聚會更形緊密了。

走筆至此，曾老闆，請容我向您壽登耄耋致賀，值此最順遂尊榮的時刻，您個人最大的收穫，應是您自我感到人生充實的無上快樂，這種快樂，也當爲所有您的家人和朋友共享。

謹此我向您我的老闆、我的良師、我的恩人；與凌駕以上一切關係的我的朋友，致上敬禮，並向您致上無限的感謝之情。



①「僑務叢談」作者梁子衡教授近影。(文見40頁)

②立法委員「患難餘生錄」作者包一民女士(前排左)偕女公子與劉大中夫婦在日月潭合影(文見50頁)。

③左起：曾虛白、沈劍虹、萬君和、馬星野合影(文見98頁)。

